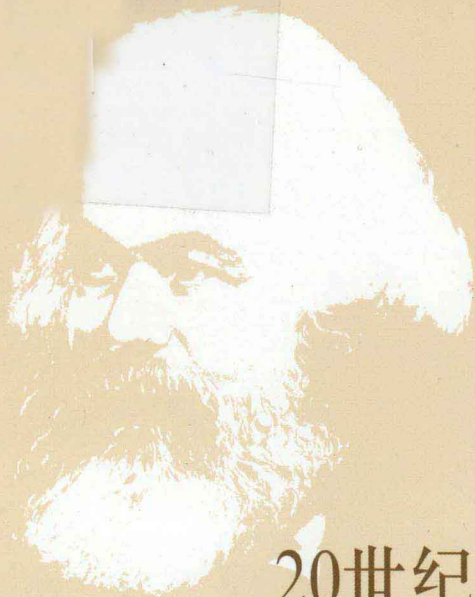




20世纪前半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若干问题研究

ERSHI SHIJI QIANBANYE MAKESI ZHUYI ZHONGGUOHUA DE RUOGAN WENTI YANJIU

杨静娴 著



郑州大学出版社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20世纪前半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若干问题研究

ERSHI SHIJI QIANBANYE MAKESIZHUYI ZHONGGUOHUA DE RUOGAN WENTI YANJIU

杨静娴 著

 郑州大学出版社
郑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前半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若干问题
研究/杨静娴著. —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11.9
ISBN 978-7-5645-0592-9

I. ①2… II. ①杨… III. ①马克思主义-发
展-研究-中国-20 世纪 IV. ①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89295 号

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大学路 40 号

邮政编码:450052

出版人:王 锋

发行部电话:0371-66966070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制

开本:850 mm×1 168 mm 1/32

印张:8.875

字数:246 千字

版次:2011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645-0592-9 定价:2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社调换

作者简介

杨静娴,女,汉族,河南南阳人。2009年毕业于天津师范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为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社会主义、中国政治。

内容提要

本书从现代性与乌托邦的关系上对 20 世纪前半叶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展开研究,并且从文化变迁、现代化追求、现代性判断、传统理想向现代转化等方面对其中的几个问题进行分析,从一个新的研究视角,进而重新对历史和现实进行评价,以从历史与现实的统一上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一些问题。

全书主要有四部分的内容:第一章对乌托邦和现代性的概念作了重新阐释和界定,指出现代性与乌托邦的张力关系是 20 世纪前半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一个深层命题。第二章和第三章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文化前提、生长机制两个方面具体阐述了现代性与乌托邦是如何交织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第四章分析了 20 世纪前半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文化贯通和超越,并且研究了 20 世纪前半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提出的问题及其现代解答。

序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已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并从政治学、哲学和思想史等各方面逐步展开,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既需要构筑体系,又需要把握它的发展进程。从最基本的历史资料出发,找到关系这一论题发展的内在关系,运用新的方法揭示它的发展线索和不同阶段所取得成果的内在联系,这无疑是一种基础性的工作。

回顾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首先从认同社会主义开始,而后再把它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相联系,根据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矛盾的特点而展开的。其中,传统理想现代转化是其前提,现代性判断与理想追求是其内在线索,实事求是其动力,现代化追求和社会主义选择是其主题。必须从以上这些方面审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才能从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上正确总结过去、判断现在、追求未来,深刻认识新民主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其中的重大意义。杨静娴的博士论文选择了这样一个题目,作为导师,我劝她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不急于构建体系。她接受了这一建议,用了很大的精力去搜集资料,并且经常与我一起讨论形成了基本思路。这既对她的博士论文写作打下了基础,对

我认清这其中的许多问题也有很大帮助。毕业并取得博士学位后,她到郑州大学从事教学工作。由于没有教学经验,一切都要从头开始,所以很忙,并为无暇为论文的深化和扩展而焦虑。我理解年轻人的这种状况,也劝她在工作上进入正轨以后再下工夫把论文进行整理出版。现在,她完成了这部书稿,我成了第一位读者。在即将出版之际,我愿就这个题目谈一谈个人的见解,并作为对杨静娴这部著作的归纳和补充,是以为序。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近代以来现代化追求与社会主义选择提出的历史命题,也是一个在实践中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过程。历史性的命题既有其起点,也有其内在的矛盾关系和实践指向。因此,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必须把握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内在矛盾,追溯它的由来、厘清它的历史轨迹,根据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从多重视角上把主题展示出来,进而在判断现实和追求未来中认识它的发展要求。杨静娴的这部著作是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问题为主线而展开的,因此读来颇受启发。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前提中提出的历史命题

马克思说过:“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①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究,也必须把握当前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回顾在历史起点上它是以怎样的方式提出的,提出的社会根据是什么?在长期历史发展中这些问题有什么进展,同时又出现了什么样的误区?中国共产党人又怎样一次又一次地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驱散迷雾,拨正航向,在改造现实的实践中推动了中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92页。

国社会发展,并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了新阶段。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上把握这一进程的主线,再从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上把这一进程揭示出来,就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所必须确立的思维方式。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它从西方到中国的移植,而是必须有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和能够与之相贯通的文化前提。19世纪下半叶以后,随着民族危机、社会危机的加剧和人们对现代化的追求,学习西方成为一种选择。在西学东渐之风日渐强劲的背景下,在西方启蒙思想吹醒沉睡中的中国人以后,源于西方的社会主义也通过不同途径传入了中国,从张德彝对巴黎公社的介绍、《西国近事汇编》对西方各国工人运动的报道,到《万国公报》连载的贝拉米的《回顾》,再到早期国民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评介,都使社会主义成为思想界关注的问题。梁启超说:“麦喀士(马克思)(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①。《政艺通报》上刊登的文章称:“于二十世纪之天地,欧罗巴之中心,忽发露一光明奇伟之新主义焉,则社会主义(即世界主义)是也。”^②在20世纪初的译书高潮中,来自日本的社会主义著作译介到中国,有人称欧洲社会主义思潮中,最受欢迎的是“马克思主义”^③。所有这些都埋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和成长的种子,既为后来认同社会主义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出了微弱的信息。

然而,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必须实现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贯通。中国人首先认同的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

① 姜义华编:《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49—50页。

② 姜义华编:《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62页。

③ [美]马丁·伯纳尔:《一九〇七年以前的中国社会主义思潮》,丘权政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5页。

中国传统文化的贯通,是与对资本主义的判断和对理想社会的追求联系在一起的。在历史步入20世纪的时候,严复宣传的进化论对人们解放思想,树立对未来的信心发挥了重要作用。康有为从对西方文明的判断中把握人类文明发展方向,并在此基础上对传统大同理想进行创新,提出了建立在现代文明发展趋势上的世界大同理想。他还把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定位在小康。这就在批判资本主义中认同了社会主义。孙中山则认为:“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需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欧洲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握文明幸福,故造成此不平等的世界。”^①并且提出:“今吾国之革命,乃为国利民福革命。拥护国利民福者,实社会主义。”^②他把民生主义视为社会主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革命的目标和任务。

对封建传统的批判是解放思想的体现和要求。在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批判中,无政府主义也曾经得到了一些人的响应。他们认同共产主义,追求大同社会,但并不能对社会的建构提供有价值的思路。他们主张实行破坏或互助,以达到废除私有财产、消灭阶级和国家、实现人人平等的社会目标。李石曾把无政府主义的宗旨归纳为:“平尊卑也,均富贵也,一言以蔽之也,使大众享平等幸福,去一切不公之事。”^③无政府主义是一种激进主义并带有明显的民粹主义倾向,但又有一定的历史作用,以致有学者说:“它对活跃思想,启发人们思考问题,反对专制统治的斗争,是有它的积极意义的。许多青年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向往,常常是以无政府主义为过渡的,无政府主义在不知不觉中成了

①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4—85页。

②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4页。

③ 葛懋春、蒋俊、李兴芝:《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167页。

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老师。”^①

近代以来中国空前深刻的社会变革和文化启蒙,使传统大同理想发生了嬗变,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批判使这种传统理想成了人们认同社会主义的文化根源。对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自由平等的理想社会的追求又表达着生计艰难的民众对旧制度的反抗。把社会主义作为理想目标规划中国的未来,这在实际中就拉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序幕。在这种文化前提中包含了许多历史的命题:既然对共产主义目标的认同先于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理解,那么如何把产生于发达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实际,既然中国人从传统理想创新中接受了社会主义,那么如何消除传统理想中均平思想的影响和实践中形成的激进主义;既然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外来文化,那么如何使之在与中国文化贯通中实现本土化;既然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现代化,那么如何实现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有机统一;等等。所有这些问题虽然是今天归纳出来的,但说明在历史命题形成之初就已经以“萌芽”的形式存在。

二、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及其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升华

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人们对它的解读还存在思维和语言上的障碍,因那时文化上的差异为理解产生于西方的这种思想设置了重重屏障。在语言文字的贯通方面,梁启超和早期国民党人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扎根,又必须在精神实质上实现与传统文化内在精神的结合。传统文化既是一个民族长期历史发展中体现出来的精神特质,又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它不是凝固的客体,而是在不断流变中实现自我扬弃和超越的过程,并且在历史发展和社

^① 朱义禄、张劲:《中国近代政治思潮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第244页。

会变革中形成和再创造自己的密码,赋予人们的活动以意义的追求。传统文化还体现为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判断和对未来的选择,体现在人们怎样思考问题,如何认识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关系,以及朝着什么方向发挥潜能。任何一种现代思想只有与传统的变革相联系,才能形成实际的生命力;任何一种外来思想只有与传统相贯通并与它的现代转化相结合,才能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发挥作用。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是一个与传统文化互读、融合,并用中国语言表达出来,形成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从中借取新语言和新理念,更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现成答案,而是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中进行的再创造。毛泽东说:“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①这在中国革命中,教条主义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大障碍,它不是在革命实践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革命所面对的问题,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而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答案,或者用其中的结论性论断套中国革命面对的问题。为此,毛泽东写了《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整顿党的作风》等一系列文章,批判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促进着马克思主义创造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沟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对二者进行了有机的结合,并在其中赋予了中国传统文化精华新的时代精神。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与中国传统“知行相资”、“经世致用”思想相结合,把实践视为主体与客体相统一的途径,对传统实事求是命题进行新的解释,使之成为一个动态性创造过程;把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与中国传统“两极相依,

①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91页。

互相转化”联系起来,提出了矛盾主要方面决定事物性质的观点,从而可以在复杂的关系中突出重点,并形成了对立统一规律的中国式表达;把马克思主义质量互变规律与《易经》中“相生相克”思想相联系,实现了二者的相互表达;把马克思主义否定之否定规律与中国文化“生生不息”联系起来,突出“扬弃”、“否定”、“继承”在其中的意义,认识真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的关系,进而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追求中,不断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变。

总之,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历史规律的研究与中国传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精神内在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美国学者田辰山认为:毛泽东的哲学体现了中国传统的通变精神,是理论和实践通过应用的相通,包括知和行、动机与效果、思想与实际、实事求是、有的放矢、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等等。实事求是解决的是思想路线问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根本性的意义,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都是实事求是的实现形式。只有实事求是才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要求。从中国实际出发,用中国语言表达出来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同时期,这种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成了分析和解决中国社会发展中问题的理论武器,也在中国革命和社会变革的实践中得到了不断丰富和发展。它不仅体现着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创造性转化,而且把民族精神上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制度选择

现代化是近代以来社会发展的主题,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派思想家所关注和力求解决的问题。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中,虽然包含了现代化的思想,但它在历史定位和术语使用上与社会主义并无内在的包容关系。这样,如何认识现代化和社

会主义的关系,也就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

进行思想启蒙,批判封建主义是现代化的先声。在中国近代以来的思想启蒙中,不论是发展工商业和交通通信事业,还是主张改革政治、发展民主和废科举兴学校、培养现代人才,都表达着现代化的追求。维新派和革命派虽然自觉或不自觉地寻求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但由于他们提出的主张和理论还没有达到唯物史观的高度,因而也就不能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把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统一起来。这就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必须加以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视野和论阈中,现代化是通过资本主义实现的,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历史超越,因而也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问题。而在中国,由于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起来,现代化还没有实现,那么社会主义的意义何在?现代工商业在少数沿海沿江城市的发展和广大农村传统社会基础的并存,造成了现代化启动的艰难和启蒙中的理性缺位。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造成了现代化难以全面展开。

为了扫除现代化的政治障碍,毛泽东提出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的革命道路。在发动农民参加革命中废除封建土地制度,进而在解放农民中改变传统社会的基础。他还多次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为着使中国人民脱离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命运,和建立一个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以农民解放为主要内容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亦即孙中山先生革命三民主义性质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中国而奋斗。”^①但他又在革命中关注着中国传统社会基础的变革。他说:“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59页。

在内)的基础……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①也就是说,他希望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扫除现代化的政治障碍,并认为现代化是建立在工业化发展之上的。没有工业化也就没有现代化。

新中国建立后,按照苏联模式建立了计划经济,这在当时虽有必要性,但在这一体制下,不仅不能满足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法治化和文化理性化的现代化要求,而且形成了权力控制社会的机制,使传统社会的许多深层弊端在当时的社会主义体制中保留了下来。社会主义在取得短暂的成就后就被置于了封闭的体制下。从根本上讲,计划经济与现代化是矛盾的。在这种体制下,传统社会的基础不能从根本上发生改变,现代化也得不到实际启动,不仅社会主义失去了生机和活力,而且造成了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的横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失去了内在的动力。

面对世界形势的变化和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邓小平不仅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命题,而且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改革开放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和社会主义本质论,把现代化与社会主义发展联系了起来,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上,使现代化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内容,社会主义成为现代化的制度选择,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历程。从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正确处理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中不断实现的。把握现代化中出现的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运用到现代化实践中,不断以新的理论充实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也就可以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新的境界。

^①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07页。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现代性判断与乌托邦追求

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必须抓住关系现代化社会主义选择的内在矛盾,进而分析这种矛盾在历史发展不同阶段所提出的问题。现代化是现代性发展中实现的社会变革过程。现代性是现代化的推动力和现代社会的特征,它是以理性主义为核心发展起来的,既体现为科学技术发展、效率追求,又体现为自由、平等的政治选择和人的祛魅与自主性发挥。现代性成长对中国现代化有无可否认的重要意义,但它又是依附于商品交换发展起来的。这样,就造成了工具理性的横行,并导致了贫富分化、道德缺失和人们精神家园的荒芜。面对这种情况,近代以来,先进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认同又是建立在对现代性判断之上的。然而,他们的社会主义追求往往带有不同程度的乌托邦色彩。

乌托邦的意义并不在于对理想社会的设计,而在于对现代性悖论的批判和对资本主义的超越。赫茨勒说:“乌托邦思想家是新思想的源泉,正如许多重要作家所证实的那样,可能也是现代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哲学以及以之作为基础的有关运动之奠基人。”^①卡尔·曼海姆则认为:“乌托邦的消失带来事物的静态,在静态中,人本身将变得与物没有什么两样。于是我们将会面临可以想象的最大的自相矛盾状态,也就是说,达到了理性支配存在的最高程度的人已没有任何理想,变成了不过是有冲动的生物而已。这样,在经过长期曲折的,但亦是英雄般的发展之后,在意识的最高阶段,当历史不再是盲目的命运,而越来越成为人本身的创造物,同时当乌托邦已被摒弃时,人便可能丧失其

^① [美]乔·奥·赫茨勒:《乌托邦思想史》,张兆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286页。

塑造历史的意志,从而丧失其理解历史的能力。”^①

在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发展中,资本主义在西方社会形成的现实,已经使人们不能无保留地崇尚和追求现代性。在西方资本主义导致现代性悖论的情况下,他们在规划中国社会发展时又有一种乌托邦倾向。但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出现了康有为的小康、大同之论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就马克思主义本身讲,它既体现着对资本主义的理性判断,又有一种理想主义的维度。在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主义思想发展中,对现代性的判断主要是基于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认识,因而带有更明显的理想主义乌托邦色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是在现代性与乌托邦之间进行选择,而是必须超越二者的视阈,恰当处理社会变革与理想主义追求之间的关系,形成指导实践的正确理论,找到使二者保持张力的核心理念。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和一切为了人民的主张,就是这种超越的体现,也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丰碑。

现代性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导致了理性主义的至上性,又造成了人们理想主义的幻灭和社会的种种矛盾冲突;计划经济者自认为掌握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并用一系列预设的制度法则规范人们的行为,把科学社会主义视为“理性大全”,从而也就无法正确处理主体与客体、必然与自由、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关系。毛泽东当年试图以道德理想主义消除现代性悖论所带来的问题,使中国社会主义体现出了一定的理想主义的乌托邦色彩。但如果从对理性至上抗议和现代性悖论批判的角度上讲,这种乌托邦还是有坚持社会主义的积极意义的。然而,一旦把超越现实的乌托邦设想付诸实践,又必然会造成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和理想之灯的熄灭,反而会引起理性至上的诉求和对现代性的盲目崇拜。

^① [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姚仁权译,九州出版社,2007年,第539页。

在改革开放中,邓小平理论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同时又强调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规定性,主张培养“四有”新人,并且提出了建设小康社会的命题。然而,现代化的全面展开和现代性的迅速成长,又使中国社会面临着社会分化、道德迷失、环境污染、精神家园荒芜等问题,使人们找不到回家的路。伯恩斯坦说:“贯穿形上学传统的冲动是乌托邦的冲动,在这种冲动中,我们进行的怀疑保有了活生生的真理灵魂,并对看似明晰与确定的东西从不停止质疑,我们所养成的对立思维方法区分出所予和应然。我认为形上学不能解决日常生活的实际问题,但形上学保有了活生生的乌托邦冲动,因而保证了敞开批评的空间。”^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把握它的形上维度,回答如何逐步消除现代性悖论的问题,以新的理念在理性与人文、现实与理想、客体与主体之间保持平衡和张力,并且以一种核心理念寻求解决各种矛盾关系的实践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讲,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

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必然和自由

客观必然性和主观创造性是社会发展相互关联的关系范畴。毛泽东把实事求是视为在改造客观世界中认识客观规律的思想路线,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确立了根本原则。把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就可以消除唯意志论和宿命论的影响,从而在现代化建设实践中不断加深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马克思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视为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并根据社会化生产力发展的趋势,论

^① 转引自张彭松:《乌托邦语境下的现代性反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9—20页。